



台中市的文人與文風

✿林柏維

一、文化協會·文化城

文化城美稱，所謂何來？顯然不是「文化」兩字的表面象徵。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台中市是新興都會，一八八五年因台灣建省，始於一八八九年築城，與鹿港、艋舺、安平相較，歷史年齡的差距使台中在實質文化上難望項背；就大專學校數目、史上文人雅士、文化社團而論，台中市也不居翹首。然而，獨獨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文化協會在台中，正是美名之源。

攤開正規教育裡的歷史課本，文化協會是什麼？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王敏川、楊肇嘉、吳三連……等等，他們是誰？議會運動、農民組合、民眾黨、台中一中、櫟社，又該如何解釋？其實，這些名詞都「很台中」，也「很文化」。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由於蔣渭水的推動，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知識菁英在總理林獻堂的領導下，以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展開喚起民族覺醒、建設台灣特種文化的啟蒙運動：發行會報《台灣民報》，設讀報社、書局、夏季學校，推展青年、婦女、農民、勞工、金融、議會運動，開本土文學、戲劇、電影的契機。文化人在城鄉間舉辦各式的文化演講會，風起雲湧，蔚成一九二〇年代全島文化運動的熱潮，使「文化的」成為進步的、改革的、台灣意識者的共同標籤，由於台中州下的文化人、文化會特多，「文化的台中市」因應而成。

基於城市歷史發展的軌跡，談二〇年代的台中人，勢必要有廣角的視野。

二、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使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台灣的歷史命運隨之轉折，到了一九〇二年日本已完全掌控台灣，面對統治者的專制統治，台灣人「二等國民」的宿命已然成形。

一九二〇年代是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黃金時期，在政治上，台灣總督府的統治基礎已完全穩固，在經濟上，農業經濟作物的推廣及資本主義的控制也已進入軌道，在文化上，日文的基礎教育推廣也已深入民間，整個殖民體制社會的建立業已成熟。這樣的空間已完全不利於被統治者之傳統武力式的抗爭。相對應於整個國際環境，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社會主義浪潮的湧現、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抬頭、相輔而成國際潮，台灣則經由日本「母國」而介入。由於歸屬的相互關係，日本社會之於台灣自然成為媒介，然而，民族血緣的存在，卻也使中國的歷史發展刺激到台灣的社會脈動，鳥瞰二〇年代及前後之歷史空間，「現代化」的知識菁英又不得不面對傳統的糾葛。

在殖民體制的社會下，接受新式教育的社會菁英，在傳統仕紳林獻堂、蔡惠如的領導下，開展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

一九二〇年，為了台灣的前途，啟發會、新民會成立，為反制六三法（它使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身），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 1934.9.歷時 14 年，共 15 回）做為主力活動。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一個集新青年（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與傳統仕紳的台灣文化協會，在蔣渭水的推動下在台北成立，舉林獻堂為總理，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展開「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建立自尊（蔡培火的主張）；建設台灣的特種文化（黃呈聰的主張）；提高台灣人的品格，消除民族差等待遇（蔣渭水的主張）。」的啟蒙運動。

文化協會的領導階層及會員以台中州最多，自然地，文化協會的重心、影響力、活動熱度也以台中州為最，隨著組織的迅速發展，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支部陸續成立。

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他們發行會報《台灣民報》、設十三個讀報社、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並繼私立台中中學（台中一中）之後，辦夏季學校、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以啟發民智。他們結合知識青年組成青年團體：台北青年會、大甲日新會、炎峰青年會、彰化婦女共勵會等。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促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澎湃發展，提倡文化劇、組「美台團」電影隊，開啟本土新戲劇的契機。他

們成立本土資本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以減輕日系資本對台灣經濟的操控。他們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企求台灣自治的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們廣泛地、連續地在城鄉間舉辦各式的演講會：講習會、學術講座、農村講座、留學生巡迴講演會，蔚成二〇年代全島文化運動的熱潮，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台灣意識成型，社會的分化現象也隨之產生；而「文化仔」乃成為具激進的、改革意識者的共同標籤，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即導因於此。

文化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使二〇年代台灣的社會空間起了發酵作用，具體表現於學潮、新文學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公益會的反制和思想啟蒙下的路線分歧等方面。

一九二五年李應章率先成立二林蔗農組合，開農民運動的先河；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新派改設本部於台中，舊派則在台中另組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同時，台灣農民組合本部也移設台中。一九二八年蔣渭水組工友總聯盟，一九三〇年楊肇嘉在台中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九三一年文化協會自然消失。二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反日運動，蔚為波濤壯闊的景象，在台灣歷史上實可說是絕無僅有，尋其源頭、主脈，則非文化協會莫屬。

二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在大正民主的場域中發展開來，蔚為巨流。然而，檢視這一階段的歷史，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不僅是反日運動的源頭、也是眾多社會運動的主軸，知識菁英從這一個團體中尋找台灣的未來，以啟蒙為標的的諸般活動，在統治者允許的空間中孕育了更多社會的領導階層，他們活躍於那個時代，也活躍於戰後的歷史舞台。多面向的啟蒙活動，刺激到潛藏的民族意識，掀起反對種族差別待遇的學潮、抗爭壓榨血汗的農民運動隨之興起；為了達到宣傳普遍化，文字使用的改革論爭使新文學運動水到渠成；戲劇的渲染效益在運動中也未被忽略，新劇運動強力介傳統戲曲的舞台，新式電影在美台團的播種下，開啟了普羅大眾的視野；夏季學校突顯民間興學的無力感，突顯差等教育的荒謬與悲哀；文化講座的流行，帶動知識分子對鄉土的熱愛，他們把才學表現於各個專長領域，講演活動打破了統治者的愚民神話、匯聚了民心與民族的情感。

三、千古風流人物

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啟蒙，首要之工作當然是文字、語言的傳遞方式；1922年黃呈聰（彰化）在《台灣青年》提出〈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1924年張我軍在《台灣民報》揭露〈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合力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乃至激起新舊文學之爭。

新文學的耕耘者大都與文化協會有關，並以新青年為主體；舊文學則以傳統詩社為據地，有趣的是，兩者皆與霧峰林家有密切的關聯。以文化協會的前後期來看，傳統仕紳與新青年連結，「願為同胞倒海傾」，反擊新文學的連橫，積極於文化講習活動，林獻堂與林幼春則為文化協會的領袖。

傳統與現代的糾葛，也展現在文化協會於二〇年代的社會運動進程中。

櫟社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詩社，與北部的瀛社、南部的南社鼎足而三，係霧峰林痴仙所首倡，以不材之木「櫟」為旗幟相號召，寓以舊文人「無用之為大用」的心志。

櫟社成員，名家輩出，諸如：傅錫祺、莊太岳、吳汝能、王學潛、林癡仙、蔡蓮舫，每於霧峰林家會聚，逢春秋佳會，必呼朋擊鉢、吟詩唱酬；感傷國族淪落之餘，也常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對運動，林獻堂、林幼春即分別擔任文化協會的總理、協理。

台中地區積極於新文學者，則有陳炘、謝春木、賴和、張星建、張深切、葉榮鐘、楊達、陳虛谷、楊守愚、翁鬧、莊垂勝等。

四、二〇年代的文化風采

1920-1925年是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也是文化啟蒙的統一戰線時期。1926-1936，即從賴和發表〈一桿稱仔〉小說到日本政府下令禁用漢文，是台灣新文學的成熟期，也是文化協會分裂後，社會運動分歧發展的時期。

在傳統文人方面，以櫟社為主體之傳統文人，依然矗立於傳統漢文詩詞文章的寫作吟唱，他們雖在1924年飽受後起之秀新知識青年的抨擊，仍堅守「敗草叢下的破舊殿堂」，在文化運動的浪潮中，他們是穩健的地方仕紳，在文協分裂後，他們支持民

眾黨，在民眾黨分裂後，他們撐起地方自治聯盟的大局，南海詩人林幼春當是典型的代表，他們憂國也憂民，實未稍遜於激進青年，選擇傳統漢文，自有他們的理念。

新文學作家，其實都致力於文化啟蒙的志業，在搖籃期中，他們以《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為舞台，文人的文風自然展現在政治的風格上，如：台灣民報記者謝春木（追風）的小說「她將往何處」訴求解放台灣的婦女。

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後的第一次大會、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化協會的總會及其活動，皆以台中市為活動領域，文化活動的標的也轉向農民及下階層社會，賴和的「鬥鬧熱」及其相關作品皆在展現勞苦大眾的悲苦，楊守愚的「斷水之後」及其他作品，皆在流露農民的悲苦情境，陳虛谷的「無處申冤」則指陳警察的暴虐；林越風的「紅蘿蔔」敘述農民組合中被出賣的農民情境。

新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移駐台中，使台中文人有著解放農民的濃烈色彩，其中以楊逵為標準典範，呂赫若則為後起之秀；相映於文化運動的分離，文人之風格也在在顯示對勞苦階級的寫實。在台灣整體社會運動移轉至台中後，1927年後的台中，人文匯聚，中央書局起著吸納的作用，並使台中在1930年代成為與台北抗衡的文學重鎮，《南音》從第七期移至台中編輯，並改由張星建主編，1934年張深切與賴明弘倡開全島文藝大會並成立台灣文藝聯盟，出刊《台灣文藝》，以賴和為領袖，翁鬧的「憨仔伯」及發表於。次年，楊逵（重要作品為「送報伙」先是發表於新民報後被禁，再於日本之《文學評論》發表《台灣文藝》）與葉陶另立台灣文學社，發行《新文學月報》。

要之，1920年代的台中文人，無論新舊，關懷普羅階層的心志是一致的，他們參與政治的風格，正如謝春木所言「走向實際運動」般，使文學風格呈現出寫實主義與人道關懷。